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2 2004
(第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

关于当前“三农”问题的一点思考
——在华南农业大学第三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江惠生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2-0001-04

目前,全国农村发展中存在着许许多多急待解决、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实践问题。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华南农业大学作为全国1000多所高等院校中的国家农林经济管理重点学科所在院校,作为国家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基地、决策咨询基地之一,由本校经济贸易学院主持举办“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论坛,意义很大。我们热切地期待,这届论坛,在“百家争鸣”、自由探讨中,产生一些关于更好地解决中国(及广东)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好思路、好观点、好意见。

本月初,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等几个单位,在昆明举办了第三届全国“村长论坛”。好多位负责同志,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西部开发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司、国家发改委农村司、国家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等单位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因此,这届昆明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峰会之一。在会上,我们获悉了这样一个信息:2004年,国家将采取一些措施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如,对粮食生产环节、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财政补贴;进一步退耕还林,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农村信用社,试办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调整征地政策,善待农民工,等等。从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这些政策措施是农村改革开展以来,全国广大农业农村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通过不断实践、研究而形成的,当然也参照了国际上的一些成功与成熟的经验。我们高兴的是,一系列正确的研究意见,正在逐步进入党和国家的高层决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就是“三农”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各级领导。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权益问题,农业富余劳动力和人口的战略转移问题,农村税费问题,土地问题,农业的财政与金融政策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农业生产布局与结构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问题,等等,仍然是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我个人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瞻前顾后”,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协力,采取综合措施才能解决。任何急功近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思路和行为,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样,在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我认为,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严谨的态度,坚持科学的理论体系,切忌“跟风”,不要去附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时髦的口号;尤其是,当某些媒体在大吹特吹某个口号时,我们需要冷静地进行必要的思考。

十年来,关于“三农”问题,有几个口号宣传得特别多,如“三高农业”、“农业市场化”、“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三高农业”指高产、高质、高效农业,是从高产、优质、高效的提法演变来的。1992年,国务院在广东召开农业会议,提出,“农业要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会后广东

收稿日期:2004-02-12

作者简介:江惠生,男,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大力宣传“三高农业”,持续了好多年,去年以来宣传少了一些。不能说“三高农业”这个口号本身有什么错,但是,在实践中,一些人包括有的政府机关人员对其作了不大正确的阐述和片面的指导,似乎什么样产品的市场价格高(某一个短暂的时期)就种养什么。结果呢?广东荔枝的黑叶等品种,以往每斤几元、十几元以上,去年每斤卖几毛钱,或一元多,广东话叫“烂市”。河源市种的最多的“布林”,开始时每斤一元多,近年卖一毛多,还不一定卖得出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不是说农民不应该种这些,问题是,一哄而起,片面强调,往往物极必反。所谓“公司+农户”,这个提法不是90年代产生的,80年代就有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下,加上那个时候农村改革已几年了,一些农产品多了,出现暂时的卖难现象。作为解决农产品流通不畅问题的一种方法,“公司+农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绝大部分“公司”并不是具有农业、农民合作性质的公司,许多是不向农民、不向社会负责任的公司。在不少地方,“公司+农户”并没有发展起来,或者一时搞起来但很快就销声匿迹。这使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问题又再次被提出来,国家和省的有关文件中就写了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文。由此看来农业合作经济理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农业产业化”的口号也是这样。本来,农业本身就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之一,那为什么提“产业化”呢?我想主要不外乎是为了改变过去农、工、贸分割,农民得不到应得的利润的那么一种状况;提倡农、工、贸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产供销互相联结、衔接,使农民在农业商品生产的全过程中,得到应得的利益,这是最主要的。同时,也可以包含这么一种意思,农业的一些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新品种经过试验、表证以后,进入经济生产,要“产业化”。简言之,就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本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有其固有的规律,也有不少现成的、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可是,认为“三高农业”、“农业产业化”等口号或提法,就可以涵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诸多方面,这难免简单化了。其实践的结果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产生了负面作用。

由“三高农业”、“农业产业化”两个口号、两个提法,我们联想到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结构问题。中央文件讲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本身是正确的。这是参照“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提法而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得不够好,也会产生偏差。农业结构调整的口号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那么,当前,要调整什么?再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大家记得1994年前后“棉花大战”的事吧。1994年,全国棉花“紧缺”,很多企业“抢购”,纷纷上纺织纱锭,国家收购(通过供销社)不到,农民惜售。怎么办?1995年初,在起草当年的农业文件期间,姜春云、陈俊生、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几个,以陈耀邦同志为负责人的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也参加了,听取了若干省同志的意见。当时,江苏省农业厅厅长提了一个建议:由中央帮助,在新疆建立优质棉花基地(新疆气候条件可生产优质的长绒棉)。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实施了。可是,结果怎么样?很快,全国棉花出现过剩,新疆的棉花也出现“卖难”。同时,全国压纱锭,在广东,不少工厂出现了砸烂一些纺织机械、坚决压产的情况。这些事情,难道没有经验教训和理论政策问题可以总结、研究吗?有的。这些年来,许多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反反复复,折腾一年,农民收入马上降下来,有的好几年都上不去。这到底是什么规律在支配?应在理论上加以揭示,并在政策上采取有效的措施。仅仅简单地说价值规律或市场经济规律起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粮食问题也是如此。几年前,粮食显得有点过剩,库存大量增长,吉林、河南等省尤甚。几年过去,现在,粮食问题又显端倪,“信号”已发出了(局部米价上涨)。我们国家经济有两大安全问

题,一是能源,主要是石油,没有战略储备;二是粮食,“牵一发动全身”。粮食安全,今年没问题,明年没问题,后年就难说了。全国粮食年消费约 1 万亿斤左右,即 13 亿人×800 斤/ 人;800 斤是“科学标准”,其中口粮约 500 斤,其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每人每天摄取 2400 千卡,75 克蛋白质,25 克脂肪。现在粮食年产 8500 亿斤左右(原因多多,包括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这几年是挖库存。不说,一般也可以分析出来,如再不能增产,问题就来了。但按目前的政策环境和生产条件,增产难度较大。所谓政策环境、生产条件,指农民积极性、耕地面积及生产保障条件、技术条件。目前技术上仍以常规育种为主,搞点航天育种;基因工程也在进行中,力求寻找能大幅度增产的基因,我校农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都在搞,但尚未取得突破。从种种条件分析,全国粮食年产达不到万亿斤。那么进口吗?《参考消息》报道,全世界有 8 亿多人挨饿。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将产生什么结果?肯定导致世界市场的震动。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搞农业经济科学的人,不能将粮食问题忘了,它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土地、农业经营制度、国家农业政策、世界贸易形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成本价格,等等。

我们要冷静思考些问题,不要被若干时髦的口号所左右。又比如目前大力宣传的“发展县域经济”和“城市化(或城镇化)、工业化”问题。发展县域经济,早就提出来了,而江泽民同志在高州的讲话,今年省委张德江同志的讲话,又讲了,讲得很好。1998 年李长春同志赴粤工作不久,我给他写了一点建议,说广东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此问题的研究尚薄弱,可以说整体没怎么研究,没“入门”。诚然,广东也有不少同志在研究此问题,只不过没怎么公开发表言论。李长春同志当时批转了我的建议信(后来开了山区座谈会)。最近,有几篇文章,依我看,还没触及要害。要害是什么?是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当然也包括国家的某些税收政策。我今天不展开谈这个问题了。

关于城市化(或城镇化),1999 年中央、国务院发了文件。党中央、国务院就推进城市化问题,专门发文件,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这个文件是很好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城市化滞后了,农村农业农民存在那么多困难、难题,许多问题的根子都可从这里去找。我们在几十年中实行了一套将农民局限在农村、农业上,局限在土地上的政策。时至今日,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跳出“三农”范围,不能就“三农”论“三农”,那样就是兜圈子,会进入“怪圈”。出路何在?就是要搞城市化(或叫城镇化)。但是,搞不好,“城市化”这个本来正确的口号也可以被歪曲而变成在新时期、新阶段剥夺农民、削弱农业、掠夺农村的口号。我说得是尖锐了一点。为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说,他搞的所谓“城市化”,就是大量地、低价地圈占农村、农民的土地;有些政府行为就是将许多本来应留给或配置给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尤其是财政与信贷资金)拿走了,拿到城市,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

问题谈到这里,又回到城乡关系中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这是很正确的。统筹城乡发展这个问题,农业农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也早有研究,现在终于形成“最高决策”。在中央的有关文件中,还讲到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词语,本来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名词术语,现在进入了中国的最高决策文件,是大好事。问题是各级的许多干部读懂这个词语了没有,会不会像一些农民不懂“三高农业”这个词一样。如英德的一位村长,将“三高农业”理解为“山高农业”,说“山很高呀”,指高山上的农业,闹出笑话。因此,各级干部的培训和再教育是个大问题,因为不仅搞工商业、财税的,就算搞农业农村工作的,都不一定了解和理解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经济贸易学院开办了一个“政策科学”专业,在省内是首个,全国院校中也许也不多。

“工业化”这个口号,也会被歪曲的。难道我们五十多年来不是一直在搞“工业化”吗?问题是搞什么样的工业化,怎样搞工业化;是剥夺农民利益的工业化,还是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工业化?这又涉及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向农民拿点利益,拿点钱,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工业化的什么阶段不应向农民拿钱?这涉及到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我记得多年前,原西北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论述过这个问题,说工业化的起始阶段会向农民拿点钱,要索取农民的利益,而工业化的中期就不应该了,工业、农业要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后期即工业化完成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什么阶段?广东,算是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吧,但并未真正实现工业化。可是,好多年以前,就有所谓的“专家学者”说什么广东已经工业化了,云云。到了1998年,在省的第九次党代会上,会议简报登了李长春、卢瑞华同志的发言,指出广东尚未完成工业化。看来高层领导是清醒的,反倒是我们有的干部和“专家”在那里胡吹。几年前有人在《南方日报》第一版发表文章,说什么广东的交通已基本现代化,仅仅凭珠江三角洲公路密度达80 Km/100 Km^2以上(其中东莞、顺德达“90”至“100”以上)就说“现代化”了。那珠海为什么说还要大搞交通尤其是对外交通呢?我们高兴地看到,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对此十分清醒,包括针对农村现状,提出大搞公路、防洪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腾飞打基础,我认为这是抓到点子上了。

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不止交通水利问题,还有教育问题等等。同时,有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就是土地整理尤其是农地整理。农地整理包括农业产业道路的开拓。“产业道路”一词在台湾被普遍使用(广东近年叫“经济路”)。台湾是搞得成功的,他们有的称之为“第二次土改”(台湾“行政院”农委会原主任说的情况),是台湾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这里面有许多理论与政策问题。实践方面,咱们国家浙江已有一些经验,广东也有点滴经验。

关于土地问题,这篇文章大得很。要坚持“永包制”,农民承包地“生不补,死不减”,按市场规则流转,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和农业规模经营的逐渐形成;不能搞“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既不是国有化,也不是私有化,而应是“集体所有制”下的“永包制”。农村土地,农民的经营权、使用权是“有价”的,但这个“价”如何确定,又涉及一系列理论政策问题,包括地租理论等等。一鼓励投资,二鼓励流转。

今天,我说多了,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总之,希望这个“论坛”连续不断地办下去,不断地探索,不断出成果,拿出高层次的决策咨询意见。农村经济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是大有前途的。十多年前,有的同志说过,“穷国的经济学就是农业经济学”。这句话有道理也有点绝对了,但农业农村经济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穷的时候,要用农业经济学;富了,仍然需要农业经济学。我以一个党务工作者、老农业农村工作者的身份,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中间,我们的教授中间,产生出理论政策研究的杰出代表。我们希望,在“论坛”这个舞台上,“多路精英”畅所欲言,活跃气氛,博采众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搞透。情况千变万化,但基本问题就是那些。我相信大家一定能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学,贡献自己的力量!